

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

中国通史简编

范文澜 著



上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

中国通史简编

范文澜 著

上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

中国通史简编

范文澜 著

下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通史简编/范文澜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0. 7

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
ISBN 7-5434-3860-7

I. 中… II. 范… III. 中国-通史 IV. K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4278 号

书 名	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通史简编 上、下
作 者	范文澜 著
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印 刷	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28.25
字 数	600 千字
版 次	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34-3860-7/K·105
定 价	36.7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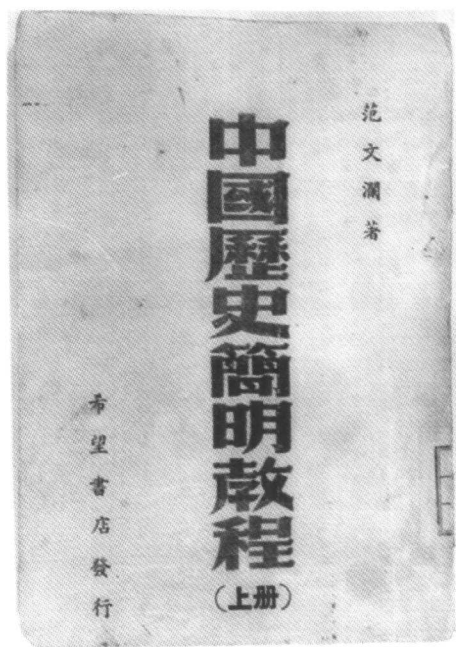


范文澜(1893~1969)字芸台,又字仲沅。浙江绍兴人。1917年于国立北京大学国史系毕业,后在南开大学等校任教。1926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女子文理学院、河南大学等校任教。1939年到延安,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、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。1946年后,任北方大学校长、华北大学副校长,并兼历史研究室主任。1949年后,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、中国史学会副主席、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。著有《诸子略义》、《正史考略》、《群经概论》、《文心雕龙注》、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及《中国近代史》(上册)等。

◎中国通史简编

半世纪以来，中国人民要求新社会的潮流一直向上高涨，您站在斗争的前头，坚持不懈地奋斗，到今天终于达到了人民的胜利，伟大的目标。今天，我们欢欣鼓舞，茶碗七杯，祝大慶美壽与强。七就是茶，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，祝美寿长强，因为您和中国人民心心相印，前赴后继，您是我们的领袖，我们得加倍努力，我们要使您行年益寿，我们得加倍努力。祝美寿长强。

1948年范文澜为华北大学庆祝吴玉章七十寿辰
草拟的祝词手迹



1947年上海希望書店出版的《中國歷史
簡明教程》書影



1943年新华书店六卷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书影



1949年新华书店三卷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书影

出版说明

20世纪是中国史学发展最显著、变革最深刻的时期。新时代、新史观、新史料、新方法、新的学术文化氛围等等，造就了20世纪的中国史学。

20世纪中国史学，大家辈出，学派林立，名著累累，异彩纷呈，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现在的中国史学和未来的中国史学都得力于并将继续得力于先贤的 these 努力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，代表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。

20世纪中国史学，是中国历史学家研究成果在学术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反映，成为时代的宏伟纪录；同时，它又反作用于前者，在促进社会变革与革命、增强爱国主义、加强民族团结、推动社会进步、提高民族素质、增益人们智慧等方面，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

20世纪中国史学，是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如果说20世纪的外国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话，那么，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国史学也在逐步扩大它对外国史学发展的影响。这种双向的

交流和影响，必将有利于推动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发展。

在世纪之交，编辑、出版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》，是对百年史学名著的整理和总结，是尊重它们在史学上的成就和史学史上的地位，也是为后人学习、研究 20 世纪中国史学优秀遗产提供方便，是学术文化积累的基础工程。同时，这个工程也为外国学者进一步了解 20 世纪中国史学提供方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套书也可看作是向世界展示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学术长廊。

本社有志于从事这一尊重前人、裨益今人、嘉惠后人的文化出版工程。目的是推动中国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、促进中外史学交流。我们在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，决定编辑、出版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》。这一工程繁重浩大，工作烦琐，限于我们的识见和能力，舛误纰缪在所难免，敬祈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1999 年 12 月

编校凡例

一、编选范围。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》编选 20 世纪出版的、对当时史学发展或对其后史学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和重大影响，即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者。专著、论集，一视同仁；名著、名篇，皆所珍惜。范围既广，其工甚巨，故先期编选部分已辞世的史学家的名著。

二、版本与编次。尽量选择好的底本，即作者的修订本或校阅本，精心编校，自成一卷。每卷冠有作者照片、小传、书影、手迹等。书首有总序，继之为目录、前言、正文，正文后或有附录，书末以作者著述要目为殿。原著按旧式提行分段者，改为现在通行的分段形式。独立成段的引文变换字体缩格排印。原著用文末注者，改为页下脚注；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小字夹注；夹注首尾原用括号者，一般删去括号；注文自成单元。

三、编校原则。除版式与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外，原著的内容及结构，一仍其旧，以存文本原貌。

四、规范用字。改异体字为正体字，改繁体字为简化字，原则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5

年12月22日发布的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《简化字总表》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国家教育委员会1988年1月26日发布的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》为准。凡属繁体字与简化字一对一者，均用简化字，如赵与赵、兴与兴等；如系多对一者或多音多义字，则根据情况区别对待，如乾、幹与干等。对于姓名、地名、书名等专用名词，如用正体字、简化字容易产生歧义者，则保留原来的文字形体，如文徵明不改为文证明，鄞县不改为户县，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不改为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等。通假字、古今字、省形字等均保留原貌。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语言，每个作者都有其惯用字词，凡有根据者则不改为现在通行的字词。

五、标点符号。凡竖排、无标点或用旧式句读者，除个别有特殊要求者或限于目前的技术条件无法排印者外，一律改为横排、新式标点。标点符号的使用，以1996年6月1日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》为准。原著有专名（如人名、地名等）号者，均予省略；如专名号所标为并列关系且非集合词语者，其间加顿号以便区别。书名号一律用规范形式（《 》、〈 〉，外文书名排斜体），原著无书名号或书名号不规范、不完整者，一律补加或改正。

六、校改错讹。原著多为流传已久的名著，对其文字一般不作改动。但确属错讹者，在所当改；一般笔画之误，鲁鱼淆舛，显系误写错排者，径改不出校记。前人引书，常有省略约减或个别词语的更动，只要不失原意，则不以所引书改动引文。确需校改增删之处，用尖括号（< >）括住的字词，表示删去；用方括号〔 〕括住的字词，表示改正；用

六角括号(〔 〕)括住的字词，表示增补。对校改增删者，一般加圈码右上角注注号(①、②、③……)，并在同页脚注中说明校改增删理由及根据，其后用“校者注”字样与原著注释加以区分。

七、残缺处理。原著中因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而致无法辨认，又无其他版本可据以核查者，根据所缺字数用“□”表示；所缺字数无法确定者，用“（下缺）”表示。

八、数字用法。一般保留原著的用法。如同一部书或同一卷书数字用法不一致时，一律用汉字表示。

总 序

戴 逸

20世纪即将过去,21世纪即将到来。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,它经历了曲折崎岖的路程,也取得了伟大丰厚的成绩。这一百年内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历史学家,像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垣、陈寅恪、胡适、顾颉刚、钱穆、郭沫若、范文澜、翦伯赞、吕振羽、侯外庐,等等,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情况。杰出的历史学家,一百年出不了几个。两千多年前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;司马迁死后一百多年,产生了班固;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;又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。11世纪产生了欧阳修和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、刘攽与范祖禹,12世纪产生了郑樵。18世纪历史学家比较多,像赵翼、钱大昕、王鸣盛、全祖望、章学诚,等等。20世纪的历史学家就更多了,代表作也比较多。最重要的是

20世纪前期完成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。同时,20世纪发现的史料大大促进了本世纪史学的发展,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。汉代在孔壁里发现了《古文尚书》,西晋时在战国魏墓中发现了《竹书纪年》,这在学术史上均可大书特书。但在古代,这种重大发现数量不算多,时间间隔也很长。20世纪史料的发现是过去任何时代不能相比的,是大批的、连续的、重大的发现;从古到今都有,极为丰富。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了甲骨文,还有金文即钟鼎文(金石文字从宋以后已有不少发现),产生了王国维、罗振玉、李济、郭沫若、董作宾、胡厚宣等一大批研究专家。如果没有甲骨文、金文的发现,他们的成绩就不会那么大。二是帛书和简牍的发现。长沙马王堆帛书和山东临沂、湖北云梦、甘肃居延等地简牍的出土,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,由此产生了劳幹等研究专家。三是敦煌文书的发现,促进了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以及宋、西夏历史研究的深入,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,产生出陈寅恪、常书鸿、唐长孺等一大批学者。四是外文材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、满文史料的发掘利用,扩大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范围,产生出陈垣、冯承钧、韩儒林、向达等一批蒙元史、中外交通史以及世界史研究专家。五是明清档案的开放使用。这部分材料极其丰富,有上千万件,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装一汽车,管理这批档案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百人;研究专家则有孟森、郑天挺、王钟翰等。有的学者非常重视史料,例如傅斯年说史料就是史学。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合适,但是强调史料的重要,也有它的合理性。有的专家穷年累月,劳精费神,一辈子搞史料,这也是对史学的贡献,不能因为他专搞史料,就说他不是史学家。史料研究是

关系到历史学盛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回顾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，可以概括出它的三个主要特点。

第一，进化史观的引进。这是 20 世纪历史学的显著标志。自从严复翻译了《天演论》，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，中国近代学术均奉之为圭臬。在此以前的史学，可以划到传统史学里去。20 世纪初，梁启超发表《中国史叙论》、《新史学》，夏曾佑著《中国古代史》，提出“史界革命”，显然是受到西方的影响，提倡以进化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。中国传统史学有一种影响很大的历史观念，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传中国的道统，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。“新史学”显然不同，主张历史是进步的。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思想中已经有进化史观的因素，但更明确地提出系统的进化观点的则是梁启超。他认为不进行史界革命，中国就没有出路。他说：“史界革命不起，则吾国遂不可救。悠悠万事，惟此为大。”（《新史学·中国之旧史》）以后的历史学家，包括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陈垣、胡适、傅斯年等人，都具有进化史观。进化史观不但认为历史是进步的，同时还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。梁启超就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一点。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，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之上的。顾颉刚提出“层累地造成古史”观，实际上是进化史观走到极端的产物。他提出了疑古辨伪思想，认为上古时代不仅不是进步的，而且儒家宣扬的那种黄金时代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。当时怀疑古书、否定古史的风气非常盛行。这种疑古观念有它的片面性，但在廓清古史迷雾方面，它是做出贡献的。古代确实有很多传说的东西，不可深信，但也不

可完全丢弃，传说中包含着历史真实的颗粒。顾颉刚等通过辨伪祛疑，还历史真实面目，功劳很大，不可磨灭。

第二，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。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伟大进步。20年代以后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。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，是更高层次上的理论，它承认进化史观，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受达尔文学说影响产生的。那么，唯物史观给史学增加了什么新内容呢？一是唯物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、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，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所制约的，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。当然，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要牢牢记住，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一样。社会有人参与，有主观参与，内容更加复杂。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，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，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，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。但历史规律是客观的，不是主观的。这一点不仅与唯心史观不同，与进化史观也是不同的。后来出现的弊端是把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看待，过分强调规律，陷入了机械唯物论。二是承认历史是前进的，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、生产方式的发展，是经济原因。历史发展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，并不仅仅是经济在其中起作用，如果单纯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，又会陷入简单的经济决定论。要重视历史发展中多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。不重视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军事的、地理的种种因素，在历史研究中就不能前进一步。因此，唯物史观一方面区别于唯心史观那种把英雄人物或思想、政治和上层建筑视为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观点，另一方面也区别于机械唯物论不承认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观点。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最重要的作用，